

经济学家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圆晨 范恒山 樊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康 江春泽 金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京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伟 刘涛雄
茅于軾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杰 吴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高亮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总顾问:成思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高级顾问:张文台(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届副主任)
编委:管益忻 陈宇 黄文夫 赵红 李千 吴明伏 白卫星
编委会主任:管益忻
副主任:陈宇
主编:管益忻
常务副主编:启文
副主编:白卫星
编辑部副主任:刘立华
主编助理:何超

第82期(总第195期) 2015年1月4日 星期日 甲午年十一月十四 投稿邮箱:jixzb@163.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8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62135959 本刊订阅方法:网易“云阅读”搜索“经济学家周报”即可订阅。 本报所刊载文章作者观点,均不代表本报意见

经济学的“新框架”与“新供给” 创新中的重要联通和“集大成”境界追求

■ 贾康 苏京春 财政部财科所

“新框架”理论并非完美,其存在对经济周期成因理解的局限性、片面性,且难以全面解决交换者之间的协调问题,但这恰恰表明在分工与专业化视角下对“新供给”形成的启发。本文进而通过对传统与新兴相结合的完整框架的综合认识,认为可形成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更为广泛、开阔的分析视角,并可积极将其运用到经济体发展实践,特别是发展中(后发)经济体的转轨分析中去。“新框架”与“新供给”的联通,客观地体现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哲理,并可进一步有力支持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追求,实现创新中更为广泛的包容性,以及体现现代经济学发展在供给侧发力打开新境界的大势所趋。

沿着传统理论经济学的发展脉络考察微观经济学,不难发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一大缺陷是不区分总量、平均量与边际量后在经历所谓“边际革命”后,古典经济学步入引进“边际”分析的新古典阶段。然而,尽管如此,这种新分析方法主要研究劳动时间与其他生产要素或产品和中间产品等的数量在边际上增减的收益和成本,仍沿袭市场资源配置思路与原分析框架相比并无本质创新,因而可将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合看待视为“旧框架”。旧框架对分工与专业化这一重要分支重视不够,或说其研究框架不能够解决与专业化经济和组织模式相关的问题,而“新框架”或称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以杨小凯等的研究成果为代表,则设计了能深化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模式。

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该模式被创始人认为可与“哥白尼与开普勒对天文学的贡献”相比肩,从而强调其之于传统经济学的颠覆性,且“新框架”也确实摆脱供求双方的传统分析而转求同一经济主体的分析视角,但其实质上仍可被认为是形成了对传统理论经济学微观部分的重要补充。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在经济学创新发展中,虽然一个是从微观层面发起的研究(即指“新框架”)、一个是从宏观层面发起的研究(即指“新供给”),但是“新框架”得到的最优化工分标准,即在“提高专业化的经济与减低交易成本之间做最优取舍”的核心主张,恰与“新供给”研究中力在理论框架中廓清和打通的“物”与“人”视角联通,或曰“新框架”实际上应可被定位为对传统理论经济学微观部分供给侧的创新,而“新供给”显然应吸取这一积极成果纳入其“集大成”的认识体系之中。我们坚信,这并不是巧合,而是经济学沿时间轴不断曲折式前进发展过程中回应经济实践诉求而势必上升的理论努力大殊途同归和螺旋式上升。本文首先对两大理论框架的交汇对经济实践的阐释出发,论述两个理论的联通,并在此基础上阐述“新框架”为“新供给”所追求的“集大成”理论框架与最大包容性所带来的贡献;接着在肯定“新框架”重要理论地位的前提下,论述其所忽略或无法解释的两个方面——对经济周期成因认识的片面性以及无法解决“交换者间协调”问题,这恰又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基于分工与专业化视角的对“新供给”的需求;最后,我们总结了旧框架与新框架相结合的相对完整框架,并阐述了新框架启发下对经济转轨的新认识。

一、回应经济实践诉求的新认识

本文所强调的新认识,至今并未系统地出现在传统理论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从微观层面而言,传统理论经济学教科书中并未展开关于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关系的研究;从宏观层面而言,传统理论经济学教科书中并未展开关于供给管理的研究。然而,“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和“供给管理”的重要性,却在经济实践中有切实体现并趋于更加显著,很有必要扩展深化其认识并纳入经济学理论框架的认知体系。

(一)微观起点:专业化与经济组织视角的缺失

在传统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以马尔萨斯的均衡思想、瓦尔拉斯一般均衡、马歇尔静态均衡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建立在需求与供给关系的基础上,并默认对微观主体进行纯生产者与纯消费者的划分,来研究如何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最优化,而这种分析框架却不能很好解释分工及专业化视角下技术变革和新兴经济组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经济实践中生产者与消费者的难以割裂,这成为专业化与经济组织视角的研究被杨小凯等人注重而促使

本文从传统经济学理论微观起点和宏观起点分析框架视角的缺失出发,论述了作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成果的“新框架”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视角,和同样作为创新成果的“新供给”的供给管理视角;分析了“新框架”的专业化经济组织与“新供给”的技术进步、“新框架”的经济组织模式与“新供给”的制度变革之间所实现的“物”与“人”视角的联通,并指出“新框架”对“新供给”的包容拓展形成贡献,补充了传统理论经济学主线上古典自由主义的供给思想。

“新框架”产生的原因。

1.传统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简述

以资源稀缺性和人之欲望无限性的基本矛盾为出发点,经济学脱胎于最初对需求与供给的思考,并沿着从古典派到新古典派的脉络发展。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最大的贡献就是分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最大的贡献则是为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引入了边际分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均衡理论框架,沿其脉络,主要包括了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均衡思想、莱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论(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以及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静态均衡理论(the statical theory of equilibrium)。

第一,马尔萨斯的均衡思想(1820)。

马尔萨斯认为,“……一切交换价值取决于以这一商品易取那一商品的力量和愿望。由于采用了共同的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用通常言语来说,社会就分成了买主和卖主两个方面。可以给需求下的一个定义是,购买的力量和愿望的结合;而供给的定义是,商品的生产 and 卖出商品的意向的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商品以货币计的相对价值,或其价格,就决定于对商品的相对需求和供给两者的对比关系。这个规律似乎具有充分普遍性,大概在价格变动的每一个实例中,都可以从以前影响供求情况变动的因素中找到线索。”由此可见,在总结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学思想的基础上,马尔萨斯对均衡的认识源自对需求和供给关系的逻辑推理,并不细致区分总量、平均量与边际量。

第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1874)及发展。

随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微观经济学研究爆发了边际革命,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正是建立在对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将古典经济学朴素认识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发展至“交换理论、生产理论、资本形成理论和流通理论”。在需求和供给关系的基础上,瓦尔拉斯认为“在既有的两种商品下,要使有关这两种商品的市场处于平衡状态,或者要使两种商品彼此互计的价格处于稳定状态,其必要与充分条件是两种商品的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须各相等,如果不存在这一均等,则为达到了平衡价格,有效需求大于有效供给的商品的价格必然要上升,有效供给大于有效需求的商品的价格必然要下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两种商品互相交换问题的解法,即本着商品最大效用定理实际上引出了效用曲线,并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两种商品的互相交换是一种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两种商品或两种商品之一的一切持有者,都可以获得他们欲望的尽可能大的满足,其间必须遵守的条件是,在整个市场中两种商品应按完全相同的交换比率进行买卖”,即“现期价格或平衡价格等于稀少性的比率”。基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微观经济学理论框架中产生了无差异曲线(等产量曲线)、边际替代率(边际技术替代率)、交换契约线(生产契约线)、效用可能性曲线(生产可能性曲线)、艾奇沃思盒式曲线等一系列分析方法,加深了微观经济学对需求曲线、供给曲线及两者均衡的研究。

第三,马歇尔的静态均衡理论(1890)。

同在对边际效用理论的基础上,马歇尔则以某一商品的价格轨迹提出并绘制了需求曲线(以产量为横轴、价格为纵轴,一般为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和供给曲线(以产量为横轴、价格为纵轴,一般为一条向上攀升的曲线),并认



为若将两条曲线绘制在一起,“当需求价格等于供给价格时,产量没有增加或者减少的趋势,处于均衡状态……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数量可以称为均衡数量,其售价可以成为均衡价格……如有任何意外事件导致生产规模偏离均衡位置,则会立即出现某些作用力使它趋于回到均衡位置”。

2.微观层面的经济实践:专业化与经济组织视角的起因

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形成对均衡的认识,反映了试图通过市场机制最优化配置资源,从而达到最优市场均衡结果的追求。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微观经济学发展框架有两大缺陷而难逃诟病:第一,始终围绕着需求和供给两者的关系,而未注意到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第二,始终遵循纯生产和纯消费的两分,表现就是从一般均衡理论到静态均衡理论,都有商品市场、要素市场乃至更多的对市场的划分,回到经济实践,不难发现其总是带有如下特点:第一,除了需求和供给两者及互动关系的影响以外,专业技术水平与经济组织形式也切实影响着微观经济的发展,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专业技术的颠覆性变化以及以股份制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组织形式的革命性变化;第二,对于市场主体而言,一般很少属于纯生产者或者纯消费者,而多同时以生产者和消费者双重身份出现。如上所述,微观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缺陷以及经济实践的诉求,实际上构成了专业与专业化视角的起因。

(二)宏观起点:供给管理视角的缺失

传统宏观经济学遵循传统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构建了以总需求和总供给为均衡分析核心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侧重于“需求管理”的政策研究。而从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的调控实践来看,决定性意义的宏观调控手段却显然属于“供给管理”,而这种调控手段的认识分析并未曾出现在宏观经济教科书中,表现出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缺陷,并且这种理论欠缺视角具有与微观层面欠缺视角指向的一致性。

1.传统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简述

对应于传统微观经济学以需求和供给两者关系为核心的分析框架,传统宏观经济学也通过首先定义总供给与总需求,绘制并研究了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以及两者可解释的宏观经济发展均衡理论。与微观经济学相比,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显然更为发散,但其根植于微观经济学的特点非常明显:第一,核心分析框架实质上是微观层面需求和供给模型的总量拓展;第二,在宏观调控上,基于微观层面对需求的研究侧重,而更加注重宏观的需求管理;第三,在研究经济增长中忽略了经济组织与制度的作用,后虽通过制度经济学得到了补充,但是并未纳入较成熟的宏观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中。

2.宏观层面的经济实践:供给管理视角的起因

宏观经济学体系的缺陷在经济实践中表现出与微观层面缺陷指向的一致性。以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为例,美国人抛开前面若干年所一再标榜的“华盛顿共识”式由市场自发解决结构问题,只注重需求管理的思路,转而采用实实在在的“供给管理”手段,如在选择性地不救“雷曼”之后出手救助“两房”、“花旗”、“通用”,明确推行“页岩革命”、“新能源汽车”等政策倾斜举措等。“供给管理”是与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需求管理”相对应的概念,后者强调需求角度实施扩张或

收缩的宏观调控,而前者则侧重于讨论使总供给发生变化的机制中更多样化的政府作为,并特别注重与政府产业政策等相关联的结构优化,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关于这种供给管理的展开讨论从未出现在传统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却切切实实地为经济主体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优化路径与调节机制,相关宏观层面的理论缺陷与来自宏观经济实践的经验实际上构成了供给管理视角的起因。

二、“新框架”与“新供给”:理论视角的联通

以上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对经济学理论缺失的分析,结合经济实践的启示,引发了对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即“新框架”)以及供给管理(即“新供给”)的新认识,且两层面对视角的指向具有一致性。我们认为,这种一致性并非偶然,而是合乎逻辑地体现了“新框架”与“新供给”两大创新努力在关注视角上的联通,此联通不但以“新框架”对“新供给”包容性下的拓展贡献,帮助我们加深了对“新供给”的认识,而且是以微观和宏观的联通考察,构成对传统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创新。

(一)“新框架”:专业化与经济组织视角的简述

1.专业化经济

专业化经济是指生产率变化与行为人的产出范围变化之间的关系。按照杨小凯的逻辑:产出与投入之间的关系就是技术,技术的最重要标志是生产率;大多数生产都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随着企业运作规模的扩大而提高,而这种生产率的提高与专业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在传统微观经济学中并未得到解答。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技术进步也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内生地出现”。专业化经济试图描述的正是生产率与专业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即技术与专业化水平之间的关系。

2.经济组织模式

如前所提及,大多数生产都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随着企业运作规模的扩大而提高,然而这种生产率的提高与企业内部组织之间的关系未在传统微观经济学中得到解答。此外,资源禀赋约束等概念在传统微观经济学中也被设定为与经济组织无关,而实际上恰恰相反,两者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可用资源多少或禀赋约束与人类社会掌握的知识有关,而人类掌握的知识又与经济组织模式有关。通常分工越复杂,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掌握的知识就越多,会直接影响经济社会中相对资源结构和禀赋约束。由分工和专业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的经济组织模式,与交易费用又直接相关。

(二)“新供给”:“物”与“人”的视角的简述

1、“物”的视角

所谓“物”,概念上必有别于“人”,但经济学研究中凡涉及关系,其展开分析也必是相对于“人与物”的关系,即“生产力”层面,由劳动对象、劳动工具而关联和推及劳动者(人,或“人力资本”)。具体到现代经济发展针对物的运用与加工的“技术”的层面,邓小平的名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指由人实现的科技创新供给对生产力三要素带来的“乘数效应”。基于“物”和“技术”的研究告诉我们,由于存在后发优势,欠发达后进经济体可以追赶发达经济体,并有可能通过“蛙跳”、技术扩散、“干中学”等方式方法,实现技术上的赶超

乃至激发组织结构方面的赶超,从而实现经济上的赶超。

2、“人”的视角

所谓“人”,必是指处于人类社会关系中的社会成员,经济学视角考察人,实质上必是指“人与人”的关系,即“生产关系”层面,或具体到经济发展而言,即如何组织经济活动的形式与制度安排、利益分配。基于“人”的研究告诉我们,制度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供给因素,尤其是产权和交易成本的机制联结状况,直接影响某一经济体的发展状态。在制度变迁即制度安排的供给演变过程中,既会出现制度演变的滞后现象,又会存在制度潜力发挥的能动性空间。计划经济制度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其相对劣势已然较充分暴露,而作为原属计划经济制度的国家,怎样成功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最重大的考验即是调整改变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改革,能否达到真正解放生产力的结果。无论是稍早风行而标榜全面“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还是稍后兴起对并未定型的“中国特色”充分肯定而将其推向模式化的“北京共识”,都难免失于偏颇。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优化提升,仍须进一步肯定其摸索前行的基本姿态,加之信息的不完全和人们行为的不确定性,例如:“柠檬市场”、“不完备信息市场”、“动物精神”、“羊群效应”、“王庆坤悖论”等因素的存在,往往造成理性预期失灵,亟需讨论如何加入“理性的供给管理”的矫正力量。

(三)两个理论创新的联通

“新框架”基于微观起点创新性地提出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结合考察视角,与“新供给”基于宏观起点创新性提出的“物”与“人”的关系打通认识供给驱动特别是制度供给的视角,实际上显然是联通在一起的。

1.基于“物”视角的联通:物质生产的专业化经济与物之运用的技术进步

“物”的视角必指向“人与物”的关系,即“生产力”层面,由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劳动者结合“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创新供给而形成的发展进步。而专业化经济是指生产率变化与行为人的产出范围变化之间的关系,其描述的是专业化水平与生产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新框架”的专业化经济视角实质上强调的是专业化伴生的技术进步,“新供给”的“物”的视角实质上强调的是国民经济总体进步对技术进步供给的倚重,体现了“新框架”与“新供给”在创新中基于“物”视角的联通。

2.基于“人”视角的联通:经济组织模式与生产关系制度变革

“人”的视角必指向“人与人关系”,即“生产关系”或制度供给问题,具体到经济生活中,即如何组织经济活动的形式与制度安排、利益分配机制。经济组织的模式及组织经济活动的形式以及制度、体制如何联通,经济组织模式的进步会带来交易费用的降低即生产力的解放(“现代企业制度”在规模经济、社会化大生产上最具适应性和代表性的具体形式——股份制,便是生动而雄辩的证明)。“新框架”的经济组织模式视角和“新供给”的“人与人”的视角实质上所强调的都是经济发展与制度供给、结构性变革之间的关系,都逻辑地关注不同制度安排下不同的交易费用,区别仅是从微观、宏观不同层面的切入而已,从而体现着“新框架”与“新供给”基于“人”的视角的联通。

(四)“新框架”与“新供给”的包容性

“新框架”与“新供给”的理论视角形成的然联通,可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新框架”对“新供给”之包容性拓展的贡献,这一拓展是以对“五维一体化”框架与包容性边界“集大成”式的概括为表现,而新框架的理论贡献也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

1、“新框架”对“新供给”包容性拓展的贡献

如上所述,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框架仍建立在传统微观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基于纯生产者与纯消费者两大假设从总供给和总需求及其互动关系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新框架”对传统微观经济学的补充,主要体现在利用超边际分析(对每一个角点进行边际分析,在角点之间用总效益费用分析)将专业化经济与经济组织模式纳入传统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基于“新框架”与“新供给”理论视角的联通,正如微观层面的供给和需求分析为宏观层面带来总供给和总需求分析,宏观角度对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的研究认识,也合乎逻辑地更坚实地建立在微观层面对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内化的超边际分析基础上。这构成“新框架”对“新供给”包容性拓展的一项重要贡献。(下转 04 版)